一位咨询师眼中的珠三角工人婚恋生态——

离职女工中三成是为了“回家相亲”

本报记者 庄庆鸿

一个个20出头的农村女孩，抱着行李从农村的土路颠簸着出发，一路换坐拖拉机、中巴车、火车来到珠三角，一年挣的工资比全家人种粮食的收入还多，却很快就头也不回地离开，这是为什么？

这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可能都顽固难解的谜题，被女孩们用四个字打得粉碎：“回家相亲！”

“婚恋问题解决不了，会造成员工流失，尤其是女性员工。这个现象在广东佛山、顺德等地的企业，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了。”我国首批注册的婚姻家庭咨询师温馨说。

“辞职回家的最小者刚20岁”

近几年，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已成常态。媒体频报，整个珠三角地区目前用工缺口达到百万数量级，甚至出现过企业派员到火车站截人的场面。而其中，普工最难招，最缺人的产业是制造业。

在“招工难”的危机下，珠三角企业才逐渐重视“留住人”的问题。

温馨从事珠三角一线企业员工的情感问题讲座，她发现，以前被放在“企业员工心理讲座”名目下的情感婚恋课堂，今年才被普遍单列出来。

在佛山一家较大的服装公司，用“回家相亲”、“回家结婚”理由请假、辞职的女性员工，占所有流失员工的30%。企业管理者很惊讶地发现：“最小的一个才刚满20岁！”

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团省委提出了《新生代产业工人婚恋问题与解决对策》议案。该议案指出，“80后”、“90后”新生代产业工人在婚恋方面普遍存在交往面窄、相处时间少、居无定所的问题。

在珠三角一带的工业区，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超时加班很普遍，往往超过12小时，但温馨说，阻碍他们恋爱结婚的，主要不是工作时间。

“在广东，通常都是一大片企业集中在工业园区，产业工人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都住宿舍。一下班没事做，就出去转转，也都有认识的机会。”

温馨说，产业工人的单身人群大，很大程度是“一边倒”造成的。

“单身男女员工相对比较平衡的企业会‘内部消化’，员工之间可能交往。但机械、模具等企业，可能80%都是男性，做服装的员工可能80%都是女性，单身现象就会严重到成为‘问题’。大型企业有能力重视，会安排跨公司联谊等活动，而中小企业则基本没人管这个。”

“企业的外来员工大都来自农村，女孩从23岁开始，家里人就非常着急了，拼命催着回家相亲、结婚，女孩自己也发愁，就会发生前面说的大面积辞职现象。”温馨说。

而单身外来务工群体过大，还会带来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一到工作淡季，农民工中的单身男性没地方去，很容易群聚出去喝酒，出现治安问题。另一方面人尽皆知的是，东莞等地存在男女关系混乱的问题。”

农民工的婚恋生态：“电话费高，压力高”

自2010年1月23日至今，富士康在华企业已发生震动全国的“十五连跳”。最新一起悲剧发生在今年7月18日凌晨3点，又有一名员工跳楼，年仅21岁。

温馨也曾经为了“体验生活”，到佛山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层文员。她的感受是：“即使每月工资5000元，我1个月呆下来也受不了！我还不是压力最大的基层工人，佛山的企业也普遍比深圳的企业压力小些，深圳的基层工人更是可想而知。”

这家企业“几乎在每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头，工人经常工作超过12小时，最长时达18小时。“这样的制度下，我看到的员工都很封闭、压抑自己，通常也不会在公司互相聊个人生活问题，得到情绪纾解。”

温馨说，在这种基层工人每月工资2000~3000元的企业，单身员工的流失量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没有理由留下来”。“单身的人进门转个圈，转身就走了。因为现在广东只会企业找不到人，不会人找不到工作。”而留下来的，基本都是有家庭牵绊的。

由此，很多珠三角企业为了留人，甚至已经开始采取“现金攻势”。“通过联谊能够牵手结婚的，不少企业有一定奖励。我知道的奖励最多的企业里，一对新人员工有5000元奖金。”温馨说。

但即使组建了家庭，长期在这类企业工作，婚姻家庭生活也会笼罩阴影。

“工作对员工的负面影响是软环境上的，在单位紧绷、压抑了8~10个小时以后回家，就不能和另一半正常地沟通交流，最严重的是三班倒的企业，尤其是夫妻在同一个企业上班的。”温馨说。

有一位在这样环境下工作的妻子，曾当着温馨的面哭了。她边哭边说：“为什么工作一天回家，遇上一点小事我都会暴躁呢？我以前性格不是这样的……”长期工作于此类企业的夫妻，离婚的占到20%，而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肯定会被笼罩上阴影。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比企业中层员工家庭艰辛，但离婚比例却比后者低。

温馨分析说：“因为他们没有‘生活质量’、‘幸福度’等概念，忙着每天辛劳赚钱、养孩子，没时间想那么多，遇到问题通常也不和专业人士咨询，在情感讲座课堂里被问起，也比较羞涩。”

那么，庞大的单身农民工群体，能否破解“婚恋难”？

温馨所在的团队办过几百场联谊婚恋活动，她认为外来务工人员不存在真正的“婚恋难”。

她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的婚恋诉求低，几乎都没有明确的婚恋价值观”。“这指的是对另一半的‘软件’，没有诸多定位，只要‘人看着顺眼、谈得来’、‘找个可靠老实的人’这样简单的理由。他们对物质要求也不大，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找。”

第二个理由是，“他们是‘奋勇前进的’，而且谈恋爱通常带着明确的结婚诉求。”在联谊活动中，敢于上台表白的，外来务工人员居多。

不过温馨也发现了外来务工群体特有的性格。“他们在参加联谊活动时会很热闹，而听情感讲座时却很羞涩，也不会提问，还会拿笔拼命记‘第一次相亲时的衣着和行为误区’。但是回去以后，并不会照做。实际上，他们遇到情感问题不大会找专家，主要倾诉对象就是同宿舍的工友、男女朋友，所以，他们消耗的电话费其实很高。”

以温馨的经验，通常一场100~200人的联谊活动，能走到恋爱的有10~20对，能走到结婚的通常有3对。“比如加班时间类似、都是放一天假的几家企业，就共同组织外出去景点、加一些交友的游戏活动环节。外出游玩的牵手成功率要比晚会联谊的成功率高一些，因为互相对了一天，了解更多。”

农民工群体能否解决终身大事？温馨还是很有信心：“虽然单身的绝对人口数量比较大，但是不难找。一线产业员工流动比较大，每年新进员工多，今年这批没遇到中意的人，明年新进的一批中就可能会有。”

让这位专业婚姻咨询师担忧的，是另一群人。

企业中层员工：“别喊他们剩男剩女”

温馨认为，真正存在“婚恋难”问题的，是珠三角企业里中层管理及以上的白领员工，这群人的年龄层是26岁~35岁。

她说起来有些叹息：“27岁~30岁的女性，是第一批接受新女性独立概念的女性，同龄女性升职通常比男性快。比如说，一名女性已经升到部门经理，她遇到的尴尬是：比我小的不可能，比我大的又都结婚了。”

“而这样的中层职位女性又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她们的心理是：虽然基本上不指望攀附权贵，也不希望找个穷小子，让生活水平下降，而很多28岁~29岁的男性还达不到同龄女性的这一要求。因此，大龄白领女性只有往上看，甚至把范围扩大到离异男性……这是社会性的问题。”

他们由于工作原因，社交圈的范围、流动性又小，“中层职位者和基层员工不一样，他们基本不会因婚恋问题换工作，多年面对的都是同一批人。这一群人，才是真正难找对象的。”

温馨也了解这群单身中层白领的生活状态。

“他们会懂得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开，不让生活影响工作，但心里对‘还没找到另一半’都有焦虑和煎熬。他们在单位里很少会谈起自己单身，只有三五好友知道。”甚至，单身贵族们会故意隐瞒单身的事实，假装有男友女友，在温馨的案例中，这一比例“很高，至少占了60%”。

“这关乎自尊面子问题”，温馨解释说，“广东有句很毒的话叫‘老姑婆’，如果给下属布置工作的时候背后被下属这样说，单身白领是很难堪的。”

了解许多人感情问题的温馨，对现在流行的“剩男剩女”之说非常反感。她呼吁，不要随便给身边的人或自己冠上“剩男剩女”之名。

“现代社会男女性的婚恋黄金期都已经随着时代延后了，比如男性的黄金期延后到30岁~35岁，我们不能再说24岁是真正意义上的晚婚晚育了，不是吗？”

“在我眼里，女人到了28岁才算‘剩女’，男人到了33岁才叫‘剩男’——如果一定要这样称呼他们的话。我更愿意称呼他们为大龄单身男女，其中优质大龄青年居多，很多人单身，有他们自己的责任，但不全是他们的责任，剩下，是时代的错。”温馨说。

黄河壶口瀑布进入最佳观赏期

受入秋以来降雨增多的影响，山西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水流量超过每秒2000立方米，水量大增，流速加快，主副瀑布连成一片，形成百米瀑布群，极为壮观。景区游客接待人数也大幅增长，标志着壶口瀑布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 闫锐鹏摄

甘肃省交通厅回应“短命高速”质疑——

主要是各个环节没有严格遵守施工工艺

本报记者 张 鹏

从全线通车到被迫返工重修，耗资80多亿元修建的天(水)定(西)高速公路，连80多天都没有挨过。

今天下午，作为主管天定高速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干了30多年工程的甘肃省交通厅工程处处长谈应鹏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回应了网络上纷纷扰扰的各种传闻。

他说：“实实在在地说，个别的是炒作，有些(文章)题目好像说是230多公里都坏了。其实只是30多公里路面破损比较多。”针对网友们认为“造价偏低导致天定高速先天营养不足”的说法，谈应鹏承认：“对施工肯定是有影响。”

谈应鹏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天定高速公路2006年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交通运输部于2007年批复设计。路线全长235公里，概算总投资87.5亿元。其中，交通部补助和甘肃省内资金28.2亿元，占总投资的32.24%，国内银行贷款59.3亿元，占总投资的67.76%。

“(甘肃)交通厅统贷统还，平均每公里造价约3700万元。”他补充说。

“这样的造价，偏高还是偏低？”记者问。“按道理说，(造价)偏低。”谈应鹏说。谈应鹏还说：“据我们了解，土建工程施工单位基本上亏损。(主要因为)2008年遇上了金融危机，钢材、油料、地方材料、人工全部涨价。”

但他同时认为，造价偏低并非是天定高速部分路段出现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网络上，天定高速被贴上了“豆腐渣工程”、“短命高速”的标签。有网友质疑施工单位是否具有合格资质，网友们还纷纷将矛头指向了施工中的层层转包“顽疾”，质疑天定高速修路中是否存在权力寻租。

对此，谈应鹏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说，在招标过程中就考虑到了对方的资质和实力，“从那个单位的资质、以往的工程业绩来说，应当说没有任何问题。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施工单位针对这个标段没有出现转分包的问题。下一步还要调查。”

据披露，此次天定高速发生坑槽病害标段的施工单位为西安萌兴高等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该公司在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自己：“萌兴公司作为专业化的路桥施工企业，工程业绩分布于湖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国内多个省（自治区）及非洲马拉维、坦桑尼亚等国家。”该公司是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具有国家建设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桥梁、路基、路面、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注册资本金10204万元，年施工能力10亿元人民币以上，曾获得中国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等多个奖项。

此前一天，有人在甘肃省政府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此次返工费用约1.2亿元，全部由施工单位承担。

采访中，谈应鹏否认了网络盛传的所谓天定高速系“七一献礼”工程的说法。本报记者检索了天定高速通车前后当地媒体的报道以及通车典礼上的领导讲话，也未找到该说法。

经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方证实，作为监理单位的甘肃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系甘肃交通厅下设的机构，这引发网友质疑。“这个可以说无止境。监管者上面有监管者，上面的监管者又由谁来监管？永远有这个问题。只能是大家各自按照职责和规章制度执行。”谈应鹏说。

在谈应鹏看来，天定高速路之所以出现质量问题，“主要是施工管理中各个环节没有严格遵守施工工艺要求。”

记者获悉，目前甘肃省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介入调查。谈应鹏亦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他透露：“下一步要重点调查，哪一个人搞的抽检，抽检的样品结果是啥，包括监理、实验室，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本报兰州9月28日电

好老师还是贪污犯？

浙江一特级教师因编写教材身陷著作权刑案

本报记者 董碧水

教师编写教材的稿酬，到底是个人合法所得，还是代单位收取的公款？

2011年7月29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法院一审宣判：杭州市教育局原教研员郑子罕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个判决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郑子罕是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原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部特聘专家。

1996年，郑子罕联络召集了杭州多所中学的教学骨干，一起编写了中小学《信息学基础》教材。郑妻邹弘称，这些老师编写该教材利用的都是业余时间。

1998年，该书以“《信息学基础》编写组”的名义，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成为杭州市一些学校信息技术课程的试用教材。

记者在最早版本的该书看到，其版权页上署名主编为郑子罕，编委由倪望跃等杭州十余所中学的老师担任。

同时，郑子罕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注明，“著作权人”郑子罕，作者姓名一栏包括郑子罕等15人。该合同明确：稿酬为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8%”。

1999年，该出版社再次与郑子罕签订出版合同，稿酬比例按图书定价的8%版税率支付。

2000年，该教材的出版方转到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书名改为《中学信息技术》。出版合同中规定，出版社向著作权人支付稿酬，版税率8%。合同有效期为10年。

2001年，《中小学信息技术》通过省级审定，成为正式教材。

此后，教材一版再版，并改编成系列教材。至2009年年底，出版社均将版税打入郑子罕的银行卡账户，郑子罕再根据各位参与老师的工作量，将稿酬分发给其他作者。

2010年初，杭州市审计局在例行审计中发现，郑子罕涉嫌“挪用和贪污公款”。

郑子罕想不明白，自己保存在银行卡中的稿酬为什么会变成了公款？原来，问题的关键在于，2005年，杭州市教育局普教室在新的负责人上任后，与出版社签订了另外的合同，著作权人“郑子罕”被更改成了“市普教室”。合同还约定：乙方以20%的版税率向甲方市普教室支付“报酬”，版税含甲方的编写稿酬和组织编写费。合同有效期为3年。2008年，同样内容的合同又签了一次。

而郑子罕对此竟一直不知情。

尽管著作人进行了变更，出版社却并未按合同将全部稿酬给新的著作权人，而是仍按以往做法，将8%直接打入郑的个人银行卡账户。郑子罕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所得，丝毫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不妥。

2010年，经数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以郑子罕涉嫌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提起公诉。2011年7月28日，下城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郑子罕有期徒刑6年。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郑子罕以杭州市普教室教研员身份，组织在校老师编写教材，应视为代表教研室主持编写，代表教研室的单位意志进行创作；教研室支付给编写者的8%报酬包括编写中的开销费用，应视为教研室对教材编写的物质支持；该教材由教研室负责征订并承担相应责任，且参与编写的教师与教研室之间并无劳动雇佣关系，故该教材的著作权应归属于杭州市普教室；包括郑子罕经手发放的8%报酬在内的20%的利润均系公款性质。

期间，被告人郑子罕将出版社支付到郑账户中的稿费转入其另一账户，用于个人购买基金进行营利活动，共计挪用稿费人民币84万余元，构成挪用公款罪。

被告辩护人、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浙江省省直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中小学信息技术》系列教材的著作权归属于郑子罕等人，它既不是法人作品，也不是职务作品，而是自然人作品，因而8%版税的稿费不是公款。郑子罕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贪污罪。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属于作者，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田▮认为，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在书稿写就时就已存在并且明确，本教材的著作权当属郑子罕等作者个人，所以因著作权而形成的稿酬不可能成为公款。

田▮说，《著作权法》规定，只有“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能视为作者、才能成为著作权人，而纵观本案，教材著作权形成之初，就可以看到并非“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志”进行创作。

《著作权法》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著作权由作者享有”。因此，田▮认为，即便该作品算作是职务作品，对照《著作权法》相应条款，著作权仍为郑子罕等编者所有，稿费当然仍不能作为公款。

有法律专家认为，本案的审理只有明确著作权的归属，才能区分涉案款项的性质。

因不服一审判决，郑子罕日前已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设个理事会，能“唤醒”公立博物馆吗

实 习 生 梅轶竹 刘智宇
本报记者 王梦婕

故宫博物馆的“十重门”洞开，将公立博物馆的封闭行政体制暴露在了聚光灯下。当“欠开放”、“不透明”、“少监督”成了公立博物馆的标签之后，“沾染暮气的公立博物馆该何去何从”发酵为公众关心的话题。

在民间，一套借鉴国外经验而来的博物馆理事会制度，为可能的改革提供了途径。

“以前，政府更多地用行政指令的方式进行博物馆管理。现在通过理事会，可以吸收一些社会组织或个人来参加博物馆的管理，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社会公众也可以通过理事会发表看法、建议，起一种监督作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物馆学家宋向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目前，理事会制度已经在一些私立博物馆、美术馆中实行，而根据国家文物局“推行博物馆的法人化治理”思路，未来条件成熟时，不排除向公立博物馆推广的可能。

公立博物馆若“试水”理事会制度，能因此重获生机吗？

理事会或将“进军”公立博物馆

根据下面的文件，你身边的公立博物馆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听从由赞助人、专家学者、社会名流甚至普通人组成的理事会的“指令”。

在国家文物局今年3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博物馆理事会组织规则”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文物博发〔2010〕8号，以下简称《意见》)里明确要求：“公共博物馆纪念馆要逐步实行理事会决策、馆长负责的管理运行机制。”

什么是博物馆里的理事会制度？

“作为一个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永久机构，博物馆在其内部实行理事会制度，是国际博物馆界的通行做法。”担任这一研究课题组长的宋向光教授告诉记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博物馆，普遍以理事会作为博物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我国，建立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已成为博物馆治理机制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宋向光教授看来，引入理事会的最大优点是让博物馆能够自治、自律。“理事会负责决策，馆长负责具体的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要由研究人员决定，国家通过税收、审计、舆论监督等手段对博物馆进行调控和监管。”他说，“这可以让外部因素整合进内部因素，将与博物馆发展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吸纳进博物馆管理机构里，为博物馆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但据宋向光教授介绍，目前，理事会制度主要还是在我国私立博物馆里推行。“比如马未都的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北京今日美术馆等。”他表示，“其实，理事会性质上类似于公司里的董事会，之所以换了个称呼，是为了突出博物馆的非营利性。”

成立于2002年的北京今日美术馆，是国内多家实行理事会制度的私立博物馆之一。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今日美术馆实行的正是“理事会体制下的馆长责任制”。

“我们的理事会是今日美术馆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它决定聘任馆长，并请监事会监督美术馆的财务、风险及战略。”张子康告诉记者，“此外，我们还有学者、评论家、策展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定期讨论美术馆在学术、教育、收藏三个环节的方向。”在张子康看来，这种做法既可以确保美术馆各个活动的学术定位与品质，又能保证财务透明与现金流畅，以及重大资金支出的安全。

“在私立博物馆比较普遍的美国，理事会制度保证了博物馆作为‘公共财产’的独立性。”张子康馆长表示。

公立博物馆该不该设理事会

尽管宋向光教授在受访时强调，“理事会的体制，是一种想法，目前公立博物馆还没有先例”，但它在私立博物馆里不错的实践，难免令公众联想：“像省市级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甚至故宫博物馆这样的公立博物馆里，该不该也有个理事会？”

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多家公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后了解到，他们对“移植”理事会制度的效果，并不乐观。

在陕西省咸阳博物馆，一名文物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如果公立博物馆全都采用理事会制，虽然服务水平、透明度可能会提高，但弊端也不可忽视：“对完全转轨成投资经营、自负盈亏的博物馆来说，没了国家财政的支持，免费开放、文物修复等不少‘不计回报’的公益性功能，其实很难开展；即使一些博物馆保留了部分的国家财政拨款，但由理事会的几个人来决策怎么花这笔钱、怎么运行博物馆，就一定是最公平的吗？会不会滋生新的腐败？”

这名文物研究人员表示，博物馆的日常功能应该是传播文化，让普通老百姓受益。“以前进咸阳博物馆一次要收20块钱的门票，老百姓即使住在旁边都不来。现在国家和省里有了政策，财政上补贴我们，对老百姓就能凭有效证件免费开放了。周围的老百姓都来了，纷纷说‘以前都不知道老祖宗有那么多好东西’。”在他看来，这是公立博物馆现有体制的好处之一，“如果都转成了理事会制度，收不收门票、收多少，理事会说了算；服务质量、透明度可能高了，但是对20块钱就能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哪个是第一位的？”

“完善博物馆管理，不是建一个理事会那么简单”

设个理事会，就能“唤醒”公立博物馆吗？

“完善博物馆管理，不是建一个理事会那么简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杨志刚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理事会不过是一个工具和手段，它要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些原则，“不是为了建理事会而建理事会”。

“比如，博物馆是一个公益性的机构，理事会要满足公益事业的理念，也要满足博物馆在收藏、展出、教育方面的功能。邀请的理事会成员，应能和这些基本的功能对应起来，切实保障博物馆履行这些功能。”

宋向光教授也向记者表示，要在公立博物馆里设立理事会，仍有一些待解的难题。

“我国的公立博物馆长期实行的都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指令性的管理，经费、人事等都要受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制约。”他透露，如果要借鉴理事会制度，还有很多条件要营造，“比如要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还要让公众和社会组织了解这个新制度，监督起来，才能让理事会发挥作用。”。

“此外，在公立博物馆里建理事会，不仅是成立个班子，还需要相应的法规、制度来保障。目前，我们还在向民办博物馆了解这方面的经验、问题，与现行制度之间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在改制，国外很多大博物馆的管理模式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宋向光教授进一步表示，“实际上，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目前面临的难题，一个是如何清晰地划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让它们都能发挥作用；另一个是博物馆公共财产的产权问题，这些都需要一步步解决。”

“中国公立博物馆现在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在文物局、文化局下面。这种管理体制其实是不需要理事会的，纯粹是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杨志刚教授建议，即使不引入理事会制度，公立博物馆现在的领导班子也要优化。“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准和管理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挑选有事业心的人到主要的领导岗位上去，让他们促使博物馆为我们的公众、公共文化、公益事业去奉献、去投入。”